

劳动力市场、婚姻缔结路径与 农村家庭代际交换*

——基于鲁东、豫南农村的田野调研

王向阳

摘要:既有人口结构视角、村庄社会结构视角和婚姻市场视角下的代际关系研究,均难以对以鲁、豫两地农村为典型代表的农村家庭代际交换高低有别这一区域差异问题做出有效解释。基于鲁东、豫南两地农村的田野调研表明:鲁东农村当地产业发达,劳动力市场本地化突出,与本地婚姻市场重合,自由恋爱普遍,情感导向的“个体择偶能力”成为主要筛选机制,婚姻成本低且较为稳定,代际交换有限;豫南农村当地产业发育有限,劳动力市场全国化突出,自由恋爱空间逼仄,相亲介绍成为主要婚姻缔结路径,以家庭经济条件为基础的“家庭支付能力”成为主要筛选机制,加之相亲时间逼仄等因素叠加作用,本地婚姻市场竞争激烈,婚姻成本日益高涨,代际交换沉重。以鲁、豫两地农村为典型代表的农村家庭代际交换差异,本质上是东中西部经济因素差异在村庄社会婚姻家庭领域中的实践表征,即东西差异。

关键词:区域差异 劳动力市场 自由恋爱 相亲介绍 代际交换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20)11-0132-09

DOI:10.19624/j.cnki.cn42-1005/c.2020.11.015

一、问题提出与既有研究

代际关系是婚姻家庭领域中一项重要的研究议题,代际交换是观察家庭代际关系的重要窗口。常见的代际交换路径有二:一是“恩往下流”^[1],即父母为了完成抚育幼子、子女婚配等人生任务而向下转移代际资源,以支付婚姻成本为典型内容;

二是家庭资源的“向上转移”,即子代履行养老责任、为父代提供养老生活支持,但转型期农村社会代际关系不对等性愈发突出^[2],且区域差异明显。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同仁在鲁东农村和豫南农村驻村调研时,发现了一个极其有趣的经验现象:同属北方小亲族村庄,鲁东农村彩礼多维持在1万元左右,取“万里挑一”之意,彩礼成本不高且较为稳定,婚姻成本主要表现为进城买房,但成本由代际

合力支付,即父母付首付、子女还房贷,自上而下的代际资源转移有限,代际交换维持在低度均衡状态;反观豫南农村,彩礼价格目前多在10万元以上,且女方对买车、买房或在村建房等提出了更高的婚姻要价要求,关键是这一婚姻成本均由父母承担,自上而下代际资源转移较多,代际交换维持在高度失衡状态。如何解释同处北方村庄社会文化背景下,什么因素以及如何影响了鲁东、豫南两地农村家庭代际交换差异?这构成了笔者最初的问题意识来源。

关于代际交换,梳理既有研究,学界已有丰富积累,其中以下三类视角较为常见:

一是“人口结构”视角。在持人口结构视角的部分学者看来,子女结构^[9]、性别^[4]等均会影响到农村家庭的代际交换,且随着父母年纪增大,代际交换逐渐减少^[5]。这类研究,多将代际交换放置在家庭人口结构内部、个体生命历程视野中予以研究,并辅以精细的定量研究方法,极大地丰富了人口学领域的代际交换研究,但却忽略了代际交换背后的伦理价值、社会结构、婚姻市场等因素,更悬置了代际交换可能存在的区域差异问题。

二是“村庄社会结构”视角。以贺雪峰为代表的部分华中村治研究学人认为,中国农村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以认同与行动单位为进路,可将中国农村划分为南方宗族性村庄、中部原子化村庄和北方小亲族村庄^[6]。北方小亲族村庄村民家庭代际责任感强,父母本体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均较为突出^[7],代际交换资源体量大,且随着现代性进村,个体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承接了家庭转型发展的代价,并最终转化为“老年人危机”^[8]。这一研究极富启发性,看到了我国农村内部明显的区域差异,并将代际交换放置在具体的家庭再生产实践中予以机制分析,但依然无法有效回应并解释同一区域内部的代际交换差异问题。

三是“婚姻市场”视角。桂华、余练认为,当前

农村婚姻市场中女性要价明显,占据婚姻市场主导权,并最终转化为父母的代际支持、甚至代际剥削^{[9][10]}。王向阳也从“婚备竞赛”的角度对这一婚姻市场的竞争结构做出了进一步分析。在他看来,适婚男女比例失衡严重、竞争性村庄结构、中度分化等将进一步加剧本地婚姻市场竞争性,进而对父母代际支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1]。作为中观分析视角,婚姻市场视角为我们理解代际交换提供了极富解释力的分析框架^[12],但却和“村庄社会结构”视角相同,同样无法有效解释“为什么鲁豫两地农村,同样是本地婚姻市场,代际交换却差别如此之大”这一实践命题。

此外,也有部分学者从人口流动^[13]、人口老化^[14]、年轻人啃老^[15]等角度对代际交换进行研究。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均无法对鲁豫两地代际交换区域差异问题做出有效解释,不同区域或同一区域内丰富的代际交换实践,迫切呼唤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

二、研究视角与和分析框架

(一)研究视角

既有研究,多从南北中国村庄社会结构差异角度解释代际交换的区域差异问题,阶层分化视角对社会结构视角做了进一步丰富和补充,但均无法对相同的社会结构内部代际交换差异问题做出有效解释。笔者在鲁豫两地农村调研期间,发现自上而下的代际交换的差异,根源在于:子代婚姻成本支付机制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婚姻成本高低,二是婚姻成本支付方式,而婚姻成本高低与婚姻成本支付方式和当地劳动力市场影响下的婚恋模式及其婚姻缔结路径关系极为密切。有基于此,笔者引入了“劳动力市场”这一视角,并以此为基础性变量建立了一个理解鲁豫两地农村代际交换差异的分析框架。

劳动力市场区域差异视角下,鲁东、豫南两地农村呈现出了两幅完全不同的经验图景:对鲁东农村而言,当地产业结构发达,就业机会丰沛,本地人多在地就业,劳动力市场本地化突出;本地劳动力市场条件下,人口结构相对完整,本地劳动力市场与本地婚姻市场重合,年轻人自由恋爱普遍,男女情感成为本地婚姻市场上的主要筛选机制,对家庭支付能力要求降低,婚姻成本较低,代际交换有限。对豫南农村而言,当地二三产业发育有限,就业机会稀缺,本地人多到外地就业,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突出;全国性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婚姻市场本地化偏好强烈,婚姻市场与劳动力市场错位严重,年轻人自由恋爱空间逼仄,相亲介绍成为主要婚姻缔结路径,在情感互动有限的情况下,家庭支付能力成为本地婚姻市场上的主要筛选机制;加之男女性别比失衡、竞争性村庄结构、社会分化等因素叠加作用,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婚姻市场竞争性,推高了婚姻成本,并最终转化为沉重的代际交换、甚至代际剥削。

(二)分析框架

有基于此,我们以“劳动力市场”、“婚姻市场”为基本维度可建构一个二维四分的分析框架,参见表1。

由此,我们可以建构出如下四种理想类型:

1.本地劳动力市场—本地婚姻市场:这类地区,二三产业发展尚可,但相比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就业机会相对有限,仅可容纳本地劳动力就业,形塑了当地“本地人不外流、外地人不流入”的本地劳动力市场格局。在本地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基于同学、同事、朋友等关系纽带的青年男女

交往接触机会多,自由恋爱土壤肥沃,且婚姻市场本地化特征突出,进而形塑了当地自由恋爱这一婚姻缔结路径的主流。自由恋爱婚恋模式下,“男女情感”为导向的“个体择偶能力”成为本地婚姻市场上的主要筛选机制,对以“家庭经济条件”为基础的“家庭支付能力”要求相对降低,婚姻成本往往较低,代际交换有限。这类地区,以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为主,大约占比我国农村地区的5%~10%,以鲁东农村为典型代表。

2.全国性劳动力市场—本地婚姻市场:这类地区,二三产业发育有限,本地就业机会稀缺,本地中青年劳动力多选择外出务工经商,打工经济是其村庄经济社会常态,进而形成了全国性劳动力市场格局。在全国性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受本地婚姻市场偏好影响,当地父母多要求青年子女在本地找对象,婚姻市场本地化实践特征突出;囿于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的切割影响,当地青年男女多长年在外打工,交往接触机会极其有限,自由恋爱发育困难,进而促使当地农村家庭普遍了相亲介绍这一传统婚姻缔结路径。相亲介绍婚恋模式下,“门当户对”或“男高女低”等传统婚恋价值观作用明显,以“家庭经济条件”为基础的“家庭支付能力”成为本地婚姻市场上的主要筛选机制,“男女情感”契合度往往成为退而求其次的婚恋考量。这种情况下,市场化的女性要价往往比较盛行,婚姻成本往往不低,且随着当地适婚人口结构、村庄经济社会分化、面子文化等因素而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代际交换较多。这类地区,以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为主,大约占比我国农村地区的80%,以豫南农村为典型代表。

表1:“劳动力市场”视角下农村家庭“婚姻缔结路径—代际交换”差异分析框架

变量	本地婚姻市场	全国性婚姻市场
本地劳动力市场	1.自由恋爱,婚姻成本低,代际交换有限,如鲁东农村	3.自由恋爱,婚姻成本低,代际交换有限,如苏南农村
全国性劳动力市场	2.相亲介绍,婚姻成本高,代际交换较多,如豫南农村	4.——

3. 本地劳动力市场—全国性婚姻市场:这类地区,二三产业发达,不仅可以容纳本地人就业,而且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对本地人而言,劳动力市场本地化突出,对外地人而言,往往更是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口净流入的人口结构背景下,本地青年男女处于全国性婚姻市场的高地,婚恋选择空间较大,自由恋爱普遍,以男女情感为导向的“个体择偶能力”成为当地婚姻市场中的主要筛选对象。简而言之,自由恋爱模式下,婚姻成本较低,代际交换有限,这一逻辑与类型1高度相似,此处不再赘述。这类地区,以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农村为主,大约占比我国农村地区的10%,以苏南农村为典型代表。

4. 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全国性婚姻市场:这类地区,二三产业发育有限,就业机会不足,当地中青年人多选择到经济发达地区务工经商,形塑了当地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特征,具备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的一般特征。鉴于婚姻市场均存在强弱程度不等的本地婚姻市场偏好,因此,对农村地区而言,随着全国性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出现,全国性统一的婚姻市场并未形成。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以川渝农村为典型代表的部分生活面向向外的农村地区而言,出现外来媳妇或外嫁女这一婚恋现象的可能性只是更大一些,但并不意味着全国性统一的婚姻市场的形成。鉴于这类地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此处不再赘述。

简而言之,如欲回答“鲁、豫两地农村家庭代际交换为何差异如此之大”这一实践命题,以上类型1、2是本文重点分析对象。类型3、4非本文研究对象,因此姑且搁置不谈,另撰文分析。本文问题意识、经验材料、尤其是学术思考均来自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同仁分别于2017年7月5日至7月25日在豫南D村和2018年3月28日至4月17日在

鲁东S村的田野调研。笔者将基于劳动力市场视角,运用田野调查和机制分析方法,试图通过对鲁、豫两地农村婚姻市场的梳理,建构起劳动力市场、婚姻缔结路径与农村家庭代际交换三者之间的有机关联,进而为理解以鲁、豫两地农村为典型代表的农村家庭代际交换的区域差异问题提供有效的解释框架。

三、本地劳动力市场、自由恋爱与有限代际交换——来自鲁东S村的经验证据

笔者调研所在的鲁东S村,下辖5个自然村、800户、2700多人、土地4000亩,人均1.5亩地,当地葱姜蒜等经济作物种植普遍,加之当地二三产业发达,经济机会丰沛,因此当地村民就业充分,且劳动力市场本地化突出。据悉,S村这一情况在当地较为普遍。因此,S村具备个案意义上的典型代表性。

(一)经验图景

据悉,鲁东S村当地青年男女目前已经自发形成了以自由恋爱为主的婚恋模式,进而形塑了以自由恋爱为主、相亲介绍保底的婚姻缔结路径。据介绍,当地青年男女主要通过同学、同事、朋友等关系纽带自由结合。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当地形成了自发且均衡的本地婚姻市场,其产生的最直接的效果是:当地婚姻彩礼价格平稳且保持在低位,目前是“万里挑一”(10001元)或“两家一起发”(31800元),主要起表情达意的功能,婚姻市场竞争性相对较弱。

此外,近年来,随着年轻人就业城市化、子女教育城市化等驱动,进城买房已成普遍趋势,尤其是近三年来,当地形成了“不买房、不结婚”的地方性共识。问题在于:以彩礼、房车等为主要内容的婚姻成本如何以及由谁来承担呢?据悉,当地彩礼价格不高,对男方的要求主要是进城买房,女孩

可视条件选择是否陪送小轿车。那购房成本由谁来承担呢?据悉,当地通行的做法是“父母付首付、子女还贷款”的代际合力支付婚姻成本的分摊机制。一来当地初婚年龄晚,子女结婚时,父母年龄普遍在50岁以上,本地适宜的工作机会不多,积累能力有限,父母仅可支付首付成本;二来当地就业机会丰富,年轻人多在县城工作,具备偿还贷款的基本工作能力。这种情况下,当地的代际交换主要体现在子代进城买房的首付成本上,对彩礼要求不高,代际交换有限。

简而言之,相比河南父母必须为子女结婚支付建房成本或买房成本、天价彩礼成本等高额婚姻成本,鲁东农村父母只需要承担起表情达意功能的低额彩礼和进城买房首付成本即可,至于子代进城生活后的婚后生活成本,对父母而言则是一笔弹性开支,有能力者多支持子女一些,无能力者则少支持,由此可见,鲁东农村父母代际交换可控且其交换的资源体量极其有限。

(二)机制分析

以鲁东S村为代表的部分中国农村,当地二三产业发达,经济机会丰富,足以容纳本地劳动力实现本地就业。在本地劳动力市场条件下,也就意味着当地青年男女多在本地就业、生活,基于学缘、趣缘、业缘等形成的同学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等社会交往较为发达,个体建构特征突出,适婚青年男女接触机会较多,自由恋爱发育土壤肥沃,并成为常见的婚姻缔结路径。在自由恋爱这一婚恋路径之下,基于情感导向的“个体择偶能力”成为本地婚姻市场上的主要筛选机制,基于家庭经济条件的“家庭支付能力”往往成为婚姻实践的参考性因素之一;同时,自由恋爱这一婚恋路径,往往可有效抑制当地村民家庭在当地婚姻市

场上的社会竞争,进而消解部分婚姻成本上涨的社会动力机制。换言之,在本地劳动力市场与本地婚姻市场重合的条件下,自由恋爱这一主要婚姻缔结路径与低额婚姻成本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

对父母而言,当子女可以自发且相对容易地解决自身感情问题时,为人父母的人生任务焦虑感必将得到大大缓解,进而形塑出当地父母介入有限、以自由恋爱为主要婚姻缔结路径的子女主导型本地婚姻市场。在竞争有限的本地婚姻市场上,在本地就业的大背景下,进城买房具有就业驱动、教育驱动等多重内生动力,也就意味着进城买房这一行为具有合理性,合理之处正在于当地城市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和内生性合理需求做支撑。在婚姻彩礼价格不高且较为稳定的情况下,当地婚姻市场上的主要要求往往就是进城买房,问题的关键正在于:其买房成本由谁来承担呢?鉴于当地适婚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普遍,在教育现代化背景下,内生延迟初婚年龄,多在二三四岁,二十七八岁也很正常,人到三十也可以接受,因此,宽松的婚恋环境给予了当地年轻人、尤其是适婚男性较为充分的积累空间,城市化成本支付较为灵活,主要根据子女就业能力和父母劳动能力而定,属于人生软任务。当然,多数农村家庭均由父子两代代际合力支付,自上而下的代际资源转移相对有限,处于低度均衡状态。参见表2。

四、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相亲介绍与代际交换无限化——来自豫南D村的经验证据

豫南D村,下辖13个村民组、804户,现有人口3896人、土地3964亩,人均约1亩地,农业收入

表2: 本地劳动力市场视角下鲁东农村婚姻缔结路径与代际交换关联

区域中国	劳动力市场	婚姻市场	婚姻缔结路径	婚姻成本	支付机制	代际交换
鲁东农村	本地化	本地化	自由恋爱	低额彩礼进城买房	代际合力	有限

有限,打工经济发达,属于华北平原典型的一般农业型村庄。因此,D村具备个案意义上的典型代表性。

(一)经验图景

据悉,当前豫南农村家庭子代婚姻成本大约在60万元以上,其中彩礼15万元以上、建房或买房(包括装修)30万元以上、车子10万元、三金、酒席等各项婚姻开支另需约10万元。因此,当地多有“一个儿子五十万,两个儿子哭一场”的说法。此外,近十年,尤其是最近三五年,婚姻彩礼价格等上涨较快,子女初婚结婚早,婚姻成本主要由父母承担,因此当地婚姻市场竞争客观上成为了以家庭单位的父母竞争,对父母的婚姻市场支付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参见表3。

这种情况下,既然是父母主导本地婚姻市场,婚姻习俗仪式等也便主要按照父母所习得的传统规范来,相亲、订亲、走亲戚、送大礼、三金、上车礼、结婚、回门等样样俱全,而子代成家前的每一笔婚姻支出,均由父母一力承担,并构成代际交换的重要内容。此外,当前豫南农村父母除了支付子代婚姻成本之外,子女婚后生活也对父母代际支持提出了更高要求,父代深深地卷入了子代家庭生活中去,进一步延伸了其人生任务链条、增加了代际交换的资源体量^[16]。

(二)机制分析

相比鲁东农村,以豫南农村为典型代表的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家庭代际交换存在差异的起点在于:劳动力市场究竟是本地化还是全国化。以笔者调研所在的豫南D村为例,当地县域经济发展一般,就业机会有限,仅可解决极少部分的在城就业需求,加之当地农业种植结构仍以粮食等传统大田作物为主,本地一二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均极其有限。因此,早在20世纪分田到户的80年代初,当地村民便开始纷纷外出,打工经济兴起早且较为普遍;2000年前后,当地逐渐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的家计模式。至此,打工经济成为当地村庄经济社会常态,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特征突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并不必然意味着婚姻市场的全国化。何以如此呢?除了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本地婚姻市场偏好之外,对以河南父母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农村父母而言,女儿远嫁意味着婚后往来不方便、养女补偿难以兑现、尤其是女儿在外受欺负时也无能提供家庭支持,因此,农村父母一般均反对女儿远嫁。既然不外嫁远方,那是否存在本地自由恋爱的土壤呢?答案是否定的。一是由于全国性劳动力市场高度切割了当地青年男女的日常工作和打工生活,使其难以具备自由恋爱的客观环境;二是对农

表3 豫南D村婚姻彩礼价格波动一览表

序号	年份	小礼	大礼	其他	婚姻成本
1	2002	600元	8000元	有房住即可	约1万元
2	2008	900元	1.2万	要求四间平房	6~8万元
3	2009	万里挑一(10001元)		要求四间平房	6~8万元
4	2010	1.6万	2.6万	要求四间平房	10万元以上
6	2011	1.6万	3.6万	要求平房向楼房过渡	11万元以上
7	2013	3.6万	6~8万	流行二层楼房	20万元以上
8	2015	16万		要求二层楼房	40万元以上
9	2017	6.6万	13.6万	流行小洋楼、买车	50万元以上
10	2019	6.6万	15.6万	要求“有车有房”	60万元以上

资料来源:整合自笔者补充性访谈记录(20190203ZJF)。

村父母而言,受传统观念影响,女儿在婚前谈情说爱往往与“有辱家风”等村庄负面社会评价相关。因此,自由恋爱这一婚恋路径发育困难,相亲介绍往往成为当地婚姻市场上的主流婚姻缔结路径。

在相亲介绍这一传统婚姻缔结路径之下,基于家庭经济条件的“家庭支付能力”往往成为本地婚姻市场上的主要筛选机制;加之当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生男偏好和计生政策复合作用所产生的人口性别比失衡,客观上加剧了本地婚姻市场竞争;不仅如此,对于适婚青年男女而言,由于大部分时间在外打工,只有春节期间短短的上十天用来相亲找对象,时间逼仄,客观上进一步加剧了本地婚姻市场上的竞争性。在相亲介绍这一传统婚姻缔结路径下,究竟是谁在找对象呢?答案是父母帮忙找对象。既然是父母帮忙找对象,那就主要依靠父代在地社会关系网络,由此进一步强化了婚姻市场本地化这一特征。在当地婚姻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加之父母与生俱来的代际责任感和人生任务感,也就意味着本地婚姻市场竞争的不可退出性。在本地婚姻市场竞争不可退出的情况下,随着当地适婚人口结构失衡程度、经济社会分化程度、面子文化等诸多因素的综合性影响下,以婚姻彩礼为主要内容的婚姻成本剧烈上涨也就属于必然趋势。问题恰恰在于:日益上涨的子代婚姻成本,究竟由谁以及如何来支付呢?

由上可知。在子代难以依靠自身顺利实现婚配的情况下,父母是不可能无动于衷、无所作为的,相反,父母往往会为了完成子女婚配这一人生任务而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并多采取以下行动:一是充分动员家庭社会关系,抓住一切机会为子女安排相亲介绍;二是较早地开始为完成子代婚配而进行最大限度的家庭积累,以体面而富有尊严地实现人生任务;三是在本地婚配困难的情况下,当地父母往往多考虑请人从外地“领

媳妇”回来,进而完成人生任务。有基于此,当地婚姻家庭以下特征突出:一是父母主导型本地婚姻市场突出,以“家庭支付能力”为主要筛选标准的相亲介绍是婚姻缔结路径的主流;二是在婚姻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当地适婚青年男女初婚年龄往往提前,既是当地婚姻市场竞争的结果,同时也是农村家庭、尤其是父母面对日益激烈的婚姻竞争的重要应对机制。子女结婚时间早,意味着年轻的子女无力承担日益高企的婚姻成本,因此婚姻成本主要由父母来承担;子代初婚年龄早,子代积累能力有限,而父代年纪尚可,多在45岁左右,至少具备5到10年的劳动时间,客观上也可以为子代提供更多的代际支持。由此观之,以豫南农村为典型代表的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父母难以退休,子代成家前,多千方百计地勤扒苦做、省吃俭用而为子代积累婚姻资本;子代成家之后,父母依旧投入到“带孙子、做家务、外出挣钱”等一系列代际支持行动中去,永无休止,直至丧失劳动能力。当然,家庭少子化,客观上也为代际支持的资源锁定和责任捆绑提供了人口结构基础。

简而言之,对以豫南农村为典型代表的相当一部分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而言,本地就业机会有限,跨地区打工经济普遍化,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突出;父母主导型本地婚姻市场条件下,婚姻缔结路径以相亲介绍为主,自由恋爱较少;加之生男偏好和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性别比失衡及打工经济兴起后在村相亲时间短暂,客观上进一步加剧了本地婚姻市场竞争性,直接推高婚姻成本和提前初婚年龄,日益高涨的婚姻成本主要由父母承担,加之少子家庭带来的人生任务、代际责任锁定,在父母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一步延长了父母的代际支持年限。因此,相比鲁东农村,以豫南农村为典型代表的农村地区代际交换的资源体量更大。参见表4。

表4：全国性劳动力市场视角下豫南农村婚姻缔结路径与代际交换关联一览表

区域中国	劳动力市场	婚姻市场	婚姻缔结路径	婚姻成本	支付机制	代际交换
豫南农村	全国性	本地化	相亲介绍	高额彩礼 建房/买房	父代支付	有限责任无限化

五、结论

既有研究多从“人口结构”“村庄社会结构”“婚姻市场”等视角来探讨农村家庭代际交换问题,却无法解释同属北方农村的豫南农村和鲁东农村代际交换为何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问题。笔者认为:除了村庄社会结构这一结构性因素视角之外,“劳动力市场”是影响不同区域农村家庭代际交换这一问题背后的重要经济根源,具体是如何勾联的呢?

对以鲁东农村为典型代表的部分农村地区而言,当地产业结构发达,就业机会丰富,本地劳动力市场突出,与本地婚姻市场重合,自由恋爱成为主要婚姻缔结路径,婚姻市场竞争性弱,婚姻成本较低,典型指标即彩礼一直保持低水平稳定状态。变化发生在近三年,随着教育城市化、就业城市化等,本地婚姻市场对进城买房提出了要求,但由于当地自由恋爱而产生的初婚年龄较晚这一因素,父母只需要负担买房首付即可,剩余贷款由子代家庭承担,婚后生活父母介入有限,主要根据自身劳动能力和子代就业能力情况而定。

对于以豫南农村为典型代表的绝大多数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而言,当地二三产业发育有限,市场机会不足,打工经济普遍,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突出;但囿于强烈的本地婚姻市场偏好的存在,并没有同步形成与之相对应的全国性婚姻市场,本地婚姻市场仍是主流。本地婚姻市场条件下,既有的适婚人口性别比失衡、相亲介绍缔结路径、相亲时间逼仄等多种因素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本地婚姻市场的竞争性,以彩礼、房子、车子为基本内容的婚姻支付成本水涨船高,对父母代际支持

力度即“家庭支付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父代家庭往往被卷入到子代家庭生活当中,且短时间看不到脱嵌的希望,代际交换漫长而沉重。

因此,对于以鲁东、豫南两地农村为典型代表的农村地区而言,家庭代际交换资源体量及其交换方式有差异,主要在于子代婚姻成本有高低之别;子代婚姻成本高低,与当地婚姻市场竞争激烈程度有关;地方婚姻市场竞争激烈与否,与婚姻缔结路径有直接关系;而婚姻缔结路径,就可以追溯到劳动力市场与婚姻市场的内在关联机制:本地劳动力市场和本地婚姻市场重合,内生发展出自由恋爱的缔结路径,本质上扮演着婚姻市场竞争的抑制机制,婚姻成本较低,代际交换的资源体量有限,且往往由代际合力支付;反之,全国性劳动力市场与本地婚姻市场错位,自由恋爱发育困难,相亲介绍成为主流,婚姻竞争藉由“代际支持-家庭支付能力”这一路径进而演化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当地村庄社会竞争,婚姻成本日益上涨,代际交换资源体量庞大,且主要由父代支付。

总而言之,以鲁东、豫南两地农村为典型代表的农村家庭代际交换差异,看似在于两地婚姻成本存在高低之别,本质上是东中西部经济因素差异在不同区域村庄社会婚姻家庭领域中的实践表征,即东西经济差异,而非南北村庄结构差别。本研究创新之处正在于:从“劳动力市场”这一视角出发,基于“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这一基础性变量,进而建构起劳动力市场、婚姻缔结路径与农村家庭代际交换之间的内在关联机制,从而对以鲁东、豫南两地农村为典型代表的相当一部分农村家庭代际交换区域差异问题做出了有效解释,丰富并拓展了既有代际关系研究。

参考文献:

[1]魏传光:《中国农村家庭“恩往下流”现象的因果链条分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第6期。

[2]狄金华、李静、钟涨宝:《转型期农村代际的不对等研究》,《中国研究》,2017年第1期。

[3]陶裕春、申昱:《子女结构对农村养老中的资源交换机制的影响》,《南方人口》,2014年第3期。

[4]周律、陈功、王振华:《子女性别和孩次对中国农村代际货币转移的影响》,《人口学刊》,2012年第1期。

[5]左冬梅、吴正:《中国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换的年龄轨迹研究》,《人口研究》,2011年第1期。

[6]贺雪峰:《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开放时代》,2012年第10期。

[7]贺雪峰:《农村代际关系论:兼论代际关系的价值基础》,《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5期。

[8]李永萍:《家庭转型的“伦理陷阱”——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的一种阐释路径》,《中国农村观察》,2018年第2期。

[9]桂华、余练:《婚姻市场要价:理解农村婚姻交换现象的一个框架》,《青年研究》,2010年第3期。

[10]陈锋:《农村“代际剥削”的路径与机制》,《华南

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11]王向阳:《婚备竞赛:共识、策略与行动——理解华北农村婚恋压力的一个中观机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12]李永萍:《北方农村高额彩礼的动力机制——基于“婚姻市场”的实践分析》,《青年研究》,2018年第2期。

[13]左冬梅、李树茁:《基于社会性别的劳动力迁移与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福利——基于劳动力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调查》,《公共管理学报》,2011年第2期。

[14]于学军:《中国人口老化与代际交换》,《人口学刊》,1995年第6期。

[15]宋健、戚晶晶:《“啃老”:事实还是偏见——基于中国4城市青年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人口与发展》,2011年第5期。

[16]王向阳:《平衡木上的华北父母:日常表现、实践逻辑与意外后果——基于农民人生价值的视角》,《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三治’协同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CZZ037)。

作者简介:王向阳,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讲师,四川成都,610031。

(责任编辑:邓颀)

编辑部工作人员

刘江涛【经济】liujt425@163.com

邓颀【社会】xxysj_sh@126.com

曹暄【经济】xxysj_jj@163.com

程平【哲学与文化】xxysj_chp@126.com

杨瑜娴【政治与法律】xxysj_zz@163.com

钱艳丽【哲学与文化】xxysj_wsz@126.com

陶秀丽【社会】taoxiuli509@126.com

王玥【版面设计】xxysj@tom.com